

目 录

我的父亲赵元任	赵新那 (1)
我知道的赵元任先生	王 力 (21)
忆元	章元善 (25)
记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	俞玉滋 (30)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	马彦祥 (46)

——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15周年作

走向文学之路	罗 荪 (67)
我的翻译生涯	张友松 (76)
郁达夫生平事略(下)	于 听 (92)
郁达夫与《夕阳楼诗稿》	于 听 (124)
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	周谷城 (130)
追忆裴文中	舒令漪 (136)
记作曲家刘雪庵	廖辅叔 (151)
我所了解的盖叫天先生	沈祖安 (158)
忆画家潘天寿	冯蒿然 (170)
黄宾虹二三事	王伯敏 (177)
木偶头雕刻家江加走	周海宇 林建平 (185)
记著名电影艺术家吴永刚	封 敏 陈家璧 (197)
我的舞台生涯(六)	袁世海 (215)

——艰难岁月

我的父亲赵元任

赵新那



1973年5月13日周总理亲切接见赵元任先生

我的父亲赵元任去年2月24日在美国剑桥因心脏病去世了。接到大姐如兰从剑桥打来的电报时，我的心都碎了，简直不敢相信。就在这以前不久，我刚刚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说秋天打算再回国跟我们团聚，说他要到北京，要去常州老家，还要来长沙，到我家住住。我正在盼望着秋天早点儿来，热切地等待着他再次回来。父亲的身体是那样好，去年6月，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接

见他，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阶梯时，还不需要别人的搀扶。我怎么能想到，在北京机场送爸爸上飞机，竟是我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我心中的悲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闭上眼睛，就好象能看见父亲慈爱的笑脸，听到父亲和蔼的声音。亲爱的父亲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

一

我的父亲赵元任生在天津，他常说，天津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出生地。还只有一、两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里人离开天津到了保定。他祖父去世那年，父亲还很小，第一次回到了江苏常州老家，住在青果巷。父亲在常州念了几年私塾，后来到南京进江南高等学堂。1910年父亲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学习。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父亲告诉我，他在康奈尔大学选修的物理课也很多，是够拿物理学士学位的。但毕业时只能拿一个学位，他就定了个数学学士。1918年父亲二十六岁，得到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在母校康奈尔大学教书。1920年回国在清华教书，教过数学、物理，也教过心理学。就在这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他到全国各地演讲时，由父亲担任翻译。父亲主要用普通话翻译。由于从小喜欢模仿别人讲话，对中国方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到了杭州和湖南，就试着用地方方言翻译。在长沙的一次演讲会后，一位湖南人跑上来问我父亲：“先生，您是湖南哪个县的人？”他以为父亲是湖南人模仿普通话模仿的还不地道，却没有想到，父亲是说普通话的人。这件事使父亲开心极了，以后总喜欢跟人说这件事。父亲为罗素当翻译十分成功，不少人夸奖他说，只有他才能把罗素演讲的内容



1921年赵元任为访华的罗素担任翻译时摄
(左起第二人为罗素，第三人为赵元任)

完完整整地翻出来，就连罗素说的笑话也能译的不走样儿。

父亲后来出国任教，花了很多时间专心学习语言学。在法国、德国、英国都学习过。1925年，清华学校增办国学研究院，父亲应聘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一起任导师，是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个。父亲在清华任教时，大表哥杨时逢跟父亲一起，到江浙两省吴语区域的各县乡镇调查吴语方言，一路上非常辛苦，父亲却兴致勃勃，经常干到深夜。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后，父亲写成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本书为后来的方言调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受到语言学界的推崇。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父亲应聘去做研究员兼任语言组组长。可以说，从那时起，父亲正式把语言学作为他一生的事业了。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南京后，父亲为语言组订了两大计划，一是计划在几年之内，把全国的汉语方言及非汉语语言都调查一遍，整理出来，作为以后研究语言的

参考资料；二是计划建造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语言实验室，把所有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制成永久性的音档，以便日后可以随时听写和整理。那一段时间里，父亲非常忙，一边亲自监督语音室的建造工程，一边拟订调查方言字表。父亲拟订了三千多字的方音调查表和一千多字的单字表以及最常用的词汇。因为要顾及调查各种方言都可以应用，父亲仔细挑选表中的每一个例字。1934——1937年，语言组分两路进行语言调查的工作。李方桂先生领队调查傣、苗、瑶、侗、藏、两广境内的僮语等非汉语；父亲领队调查方言，先后调查了安徽徽州一带六个县，江西境内五十余处，湖北、湖南两省各县城乡。1937年，父亲正准备调查福建全省方言时，芦沟桥事变爆发，调查工作被迫中断。父亲研究方言的著作有《鍾祥方言记》、《瑶歌记音》、《湖北方言调查》两册（此书是与其他四人合作的）等。就在父亲进行方言调查的那段时间里，根据父亲设计、绘图的语音实验室也建造完毕。据多年来给父亲做助手的大表哥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有四大间，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铺着地毯，隔音效果很好。还有几十种仪器，有当时最新式的录音机、音浪计（记声调用）、音叉、留声机等。父亲还亲自设计了一个超高率的扩音器，制成后，比美国买来的音质好，扩音效果强。为研究方言，语音试验室收集了六、七百张地方戏剧和相声唱片，甚至还收集了二十余套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父亲建语音实验室时我还小，他喜欢带我去看，给我讲隔音板的用途，得意地给我指点录音设备，他对自己建立的语音实验室特别喜爱。父亲利用这间语音实验室完成了不少语言研究工作，把调查的语言灌制了近千张铝片音档。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全家人随历史语言研究所往内地迁。家里的书全部丢了，调查方言的计划也没有完成，这是父亲最伤心的事。

语音实验室的建成和方言调查工作的进行体现了父亲的远大抱负和工作热忱。他始终非常怀念那段紧张而又充满乐趣的工作。解放后他两次回国，每次都一定要到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要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照张像。

父亲早年和黎锦熙先生一起，致力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两人一起编制注音符号。父亲很早就关心中国文字的改革，他认为搞学问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他主张文字改革，主张汉语拼音，创造了国语罗马字。国语罗马字用于外国人学中国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父亲还谱了几支曲子，《勺父口亡……》、《韵母表》、《分四声》，帮助大家学习和记忆。父亲亲自灌制了大量的“国语留声片”，推广“国语”（也就是现在说的普通话）。直到现在，还有人对我说，他学国语就是从听父亲灌的唱片开始的。

父亲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他自己带头写白话文。1923年，他用地道的白话翻译了 Lewis Carroll 的两本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和《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原文里有些字是字典里查不到的，是作者为了表现儿童的心理、思维和语言而编造出来的“文字游戏”。为此父亲下了很大的工夫，译文也很考究，以中文的“文字游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尤其是其中几首诗的译文，真是传神极了。我们小时候，父亲喜欢念这两本书给我们听，有时用中文，有时

用英文。为了使我们理解书的内容，他给我们介绍有关的背景，教我们下外国象棋（Chess）。等我长大后再回过头来读父亲的译文，越读越觉得有意思，越读越觉得译得地道。

语言学的研究是父亲毕生的事业，也是他生活的乐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他回答说：“好玩儿。”三妹的名字赵莱痕思媚，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三妹为什么有这么长的名字。三妹小时候叫“Len sei”，是父亲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应的汉字，所以三妹小时候的名字，实际上是有名无字，上学后才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父亲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大姐是学音乐的，总感叹父亲的听力直到晚年都比她的耳朵灵。父亲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他能够把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确实，父亲对于音韵和音位的研究真是到家了。

父亲通晓多种外语，他可以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对话，还懂日语、世界语、拉丁文及古希腊文。

父亲一生中在国内外出版了语言学专著三十多种和论文一百多篇，如《语言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文字》、《国语入门》、《国语词典》、《语言学跟符号系统》，论文有《音位标音的多能性》、《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其中不少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父亲在美国时，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还编过字典。

父亲晚年一直致力于《通字》的研究，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

现代方言，把《康熙字典》上10,000多字写成一本2,100字的《通字方案》，用于日常行文。1973年，父亲回国探亲，周总理接见了父亲，很关心父亲的通字研究。父亲治学态度严谨，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他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我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父亲，每天坐在书桌前，还在研究《通字方案》，直到1981年最后一次回国才带回手稿。《通字方案》一书，不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父亲最后一部著作，它能在祖国大陆出版，我们姐妹四人都感到欣慰。

我国语言学界，一向给予父亲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语言学的始祖”、“中国语言学之父”。我想，父亲所以能够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原因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的，

“赵先生以活的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这条新路。”我国另一名著名语言学家、父亲早年的学生王力先生也说过，“赵先生之前的语言学其实只是语文学、文字学。”

父亲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足见他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人。

二

父亲在音乐方面的活动绝大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跟随着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造社会的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所以很有影响。很多人认为他是个作曲家，或是先知道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而后知道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

音乐是父亲一生的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美国读书时，喜欢选学音乐课程，包括作曲、合声、对位等等。他练习弹钢琴，也学习过声乐。

父亲的音乐创作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他谱过几支钢琴曲，发表在国内的《科学》杂志上。父亲的开拓精神，敢于改革和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他大胆地把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1927年《新诗歌集》就是这种尝试。《海韵》（徐志摩词）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唱得最多，也最受欢迎。《听雨》、《上山》、《也是微云》都是富于诗意的抒情歌曲。《劳动歌》带有劳动号子的调儿。“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子给人住……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这首歌唱出了工人要求享有工作、教育和休息的权利的呼声。《卖布谣》

（刘半农词）表达了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处于贫困境地的小生产者的同情。父亲教我们用无锡方言唱这支歌，他说用方言唱更能唱出感情。《呜呼三月一十八》（刘半农词），表达了对被屠杀的爱国学生的同情和对段琪瑞反动军阀政府的强烈愤慨。1920年，父亲作词作曲的《尽力中华》更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激情。我是1923年出生的，父亲为我取名为“新那”，意为“新的支那”（支那也就是中国）。直到现在，父亲的老朋友丁绪宝伯伯还叫我“新中国”。父亲是多么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东方！

父亲的音乐创作给二十年代的中国音坛带来了新鲜的风格，他的歌曲透着新意，这引起了一些人对父亲的批评，说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父亲在《新诗歌集》序言中尖锐地

指出，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叹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 picturesque(景色如画的)， quaint (离奇的) 等等形容词。”父亲反驳这种错误观点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父亲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是多么具有民族气节！中国是要前进的，中国的音乐也要推陈出新，不断向前发展。

父亲特别强调歌曲的民族风格儿。1930年前后，他曾在长江畔，静静地倾听船夫们撑船时唱的号子，把他们和激流搏斗时唱的充满活力的哼唷声如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了《扬子江上撑船歌》。1981年，父亲在上海音乐学院听到一位同学唱《教我如何不想他》，歌儿刚唱完，父亲马上走到她跟前和她握手，热情地说：“谢谢你，你唱得好。你唱最后一句‘不想他’的‘想’字时，没有用滑音。”父亲解释说，用了滑音就唱洋了。

抗日战争前后，父亲写了很多爱国歌曲，有《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还给一部进步影片《都市风光》谱了主题曲。

父亲配合陶行知伯伯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伯伯的许多诗谱曲，有《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等。父亲还写了很多校歌。

父亲的音乐创作也丰富了家庭生活。一到春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喜欢唱《春天不是读书天》。我们学英文字母，学国语罗

马字，学注音符号，父亲就教我们唱《ABCDEFGH……》，《ㄅㄆㄇ……》，歌儿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表姐杨若宪小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第一个学会了国语罗马字的，父亲奖给她一顶帽子。我们学算术，父亲把乘法的九九表也配上歌儿，我们边唱边背，兴趣可浓了。父亲有时还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的课文谱曲，配上和声，《一群绵羊》就是从我的小学课本里挑出来谱上曲子的。父亲给我和姐姐编过一个歌儿《唱唱唱》，这是完全是为了让我们唱着玩编的一支轮唱歌曲。一开始，一段歌的结尾是“这个歌儿并不长。”可是后来，父亲转个调儿，又让我们接下去“唱唱唱”，结尾就成了“这个歌儿有点儿长”。没过多久，父亲又把这首歌改编一下又接长了一段，最后，结尾变成了“这个歌儿真是长”。大姐跟我唱这个还参加过比赛。



1979年12月赵元任全家在美国加州伯克来团聚

(后排右起：赵新那、赵元任、杨步伟、
赵小中；前排，右赵如兰左赵莱痕思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南京迁到长沙，从长沙又到昆明，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一黑灯也没有了，但是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两个妹妹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性，自然唱男低音。我的嗓子高不成低不就，只好唱女中音，大姐补上第四部。一到天黑，大家就唱起来。几十年过去了，1979年我到美国探亲，赵家歌咏团又愉快地唱起来了。

三

父亲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语言研究和音乐创作上，在婚丧大事上也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摆脱封建习俗。听父母说，两人家里都曾为他们包办订了婚。母亲还没有出世就订了婚，父亲也有个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他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更讨厌各种繁文缛节，从不讲究排场。1921年6月1日，他们各自请了一位好友，在他们自己拟订的婚书上签字作证，把到邮局给亲友们寄出结婚通知书的时间作为完婚时间，最后在中山公园自拍一张照片留念。父母亲的婚姻被报纸誉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不少好友纷纷仿效。后来我结婚，我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举行仪式，没有请客。

父母亲在世时，就和我们约好，他们去世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实行火化，两人的骨灰一起撒在太平洋。母亲去世后部分骨灰根据她的遗愿，撒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她的祖父杨文会（字仁山）的墓塔下面。母亲小时候，是她祖父最宠爱的孙女。

父母去世后，根据他们生前所嘱，房子赠给他工作多年的加州大学，书刊和遗物分送给许多学校和亲友，一部分杂志赠给北

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正如父亲说过的，他“是属于世界的”。

四

父亲喜欢新鲜事物，对各种科学现象都极有兴趣。有声电影刚一问世，父亲就带着我们去看，还给我们讲解它的科学原理。三十年代曾有一次日全蚀，父亲带上全家人，自己开车从美国华盛顿赶往梅因（Maine）州去看日全蚀。路上一口箱子掉到车外去了，也顾不得回去找，唯恐错过了看日全蚀的机会。

父亲上康奈尔大学时，很喜欢物理，因此，家里的大小“机关”可真不少。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父亲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了。等他起来时，火也上来了，屋子也烧暖了。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不是电冰箱），我们几个小孩子常常忘了关上冰箱的门，父亲就接上“机关”，门一开灯就亮了，没有关上门，灯就老亮着，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父亲常要我们用物理学原理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冬天，脱下皮大衣时，他问我们为什么皮大衣上会冒小火花，产生放电现象。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又问我们，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父亲很疼爱孩子，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时间总花在孩子身上。大姐和我上小学时，父亲晚上常给我们读英文故事。记得他给我们读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小说。我们一边跟父亲学英文，一边觉得好象也到了密西西比河。父亲一有机会，就带我们参观博物馆、世界博览会、天文台、天文馆、水族馆等，边看边耐心地讲解。还教我们唱歌、弹钢琴。周末有

机会还带我们去听交响乐音乐会。

父亲对我们的功课抓得很紧，也常辅导我们。1938年我到美国上中学。从中国的学校一下子转到美国的学校，什么课都是英文的，代数、生物、历史……拿起代数课本，连“plus”（加）都不认识，老师都为我着急。老师说：“怎么办呀，你这怎么学得下去呀？”为了帮助我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每天晚上父亲帮我在英文生字旁边加中文注解，一注就是一百几十个。高中三年级时我参加数学比赛，没有获奖，我很失望，父亲把我解题的过程仔细地看了一遍后，鼓励我说：“你答对了，只是解的方法绕了点儿弯儿。”我在美国上中学和大学时，放学回来总是在父亲跟前复习功课，一遇到困难，父亲总是耐心地启发我思考从不嫌烦。晚饭后，我常跟父亲一起弹钢琴二重奏。

父亲善于体谅孩子们的心情。我记得三妹小时候曾经因为别人说她长得不如小妹好看生气了。三妹过生日那天，父亲一清早就起来了，还穿着睡衣，就把三妹叫到跟前，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儿唱给三妹听。最后两句是“菜痕思媚，祝你一年比一年更加美。”三妹听了后，快乐极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同时也很羡慕三妹。

在生活上，父亲对我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我七、八岁时得了一场重病——肺炎加肋膜炎，那时还没有青霉素，只好用一种很烫的药膏敷在胸口上。每次上药我都哭着不肯，父亲哄我说，等他数完“九九表”就可以把药膏拿下来，这么一说，我就肯了。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他数得很快，越往后数就越慢，到最后数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字一顿了。

父亲对孩子从不打骂，也没有“家长作风”，讲平等、讲民

主，以理服人，所以我们从内心里尊重他、爱他。

和父亲在一起有很多的乐趣。有一次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吃完饭父亲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支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磁的餐具中挑出 do、re、mi、fa、so、…… 的音来。我们高兴极了，都拿起筷子帮着找，东敲一个碗，西敲一个盘子，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着。父亲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就这么一敲，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大家全乐了。顿时，家庭“音乐会”叮叮咚咚地开演了。

父亲的生活朴素，最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很多家务事都是他干。他钉扣子最有意思，他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父亲上了年纪以后更加喜欢小孩子。1973年父母亲回国，在北京参观了一所幼儿园，他非常喜爱这些天真活泼的小孩儿。母亲说：“赵先生还会唱小孩歌呢！”父亲马上站出来唱给孩子们听：“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你就比一个小孩子还更小、小、小。”这个歌儿是父亲谱曲，陶行知伯伯作的词。

父亲1981年回国第一次见到他的不到两岁的重外孙又新。隔着海关的玻璃就跟又新招起手来了。在国内的四个星期，一有机会就跟又新玩，看又新认画片，听又新背唐诗。他最喜欢听又新叫“太外公”，不管声音多么小，一听见马上就答应“唉”。父亲回美国后，经常来信，没有一封信不提到又新。

五

1938年，父亲受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邀请，到美国讲学，全家人又到了美国。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和培云先从美国返回，父母也准备第二年启程回国。听父母亲说，我离家后不久，父亲收到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请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报，他拒绝了，回了一封电报：“干不了，谢谢！”后来父亲也就没有如约回国。我二十三岁离开家，告别父母，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七年。

1973年，父母亲回国探亲访友，随行的有大姐的女儿昭波和女婿迈克。我带着两个儿子急匆匆地赶到广州，由于和接待单位没有接上头，所以在广州没有见到。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亲是带着许多疑问回国的。在广州没有见到我，到了北京又没有见到，更疑心我出了什么事。培云因开会正好在北京，心直口快的母亲抓住他说：“我向你耍人。”限几天交人。几天后，我们终于在北京团聚了。父亲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老一点儿了。母亲的样子全变了，如果在路上碰见我会认不出她来，但她的声音和脾气却一点儿没变。父母亲第一次见到两个外孙，就非常喜欢他们，后来还对别人说，他们并不觉得两个外孙是陌生人，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自然。

父母亲回到祖国心情非常兴奋。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没等人安排，就叫了汽车到中关村去看望我的舅舅、舅母。四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分别三十五年之后，又见面了，真是高兴极了，又是照像，又是回忆往事，相互问长问短，没有个完。

父母亲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七十多人，都是几十

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这使父母亲非常高兴和感动。父亲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父母亲除了愉快地会见老朋友，就是看老地方。当年父母亲结婚后住的房子，父亲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他的堂弟一家人，还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照了像。在常州的一所中学，父亲和师生们用常州话座谈。离开常州时，父母亲特意带上两盒烧饼，去给在美国的朋友们尝尝家乡的风味。

5月13日晚到5月14日清晨，周总理、郭沫若、刘西尧一起接见了父母亲，交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周总理还请来了父亲的许多老朋友，有吴有训夫妇、周培源夫妇、竺可桢夫妇、邹秉文一家，还有黎锦熙、丁西林……等。父亲平时话不多，那一次却抢着说话。总理跟父亲谈到了文字改革，谈到了《通字方案》，跟母亲谈到她的祖父杨文会（字仁山）创立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工作，还谈到了计划生育。母亲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1922年译了一本《女性须知》的书，提出了节育的主张。父母亲非常钦佩周总理渊博的知识和对情况的熟悉。会见中间，总理吃了一次药，母亲很不安，几次要总理休息，可是总理几次说，再谈谈，再谈谈。会见中，总理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夜点——粽子、春卷、小烧饼、绿豆糕。一个个都做得小巧玲珑、样式别致，适合老人食用，连馄饨都是用一只漂亮的小碗盛着。父母亲吃到了地道的中国点心，心情非常高兴，可是总理还遗憾地说，忘记关照厨师熬北京的粥请大家喝了。会见的气氛极为自然，随便，以后，父亲总是用“亲切”两个字来概括那次难忘的会见。

父母亲在国内见到了许多亲人和朋友，看到了家乡的变化和